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2012年第4期（总第20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2年11月25日

目 录

《胡适藏书目录》序·····	耿云志 (1)
梁启超与胡适——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耿云志 (4)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研讨会开会词·····	耿云志 (8)
《胡适文集》前言·····	朱 正 (10)
胡适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邹新明 (16)
胡适与萨本栋通信时间考·····	董立功 (24)
胡适对待谩骂的态度·····	张书克 (31)
胡适果真气量狭小吗?·····	焦 鹏 (33)
战时胡适以书面形式发表之言论目录·····	胡慧君 (35)
《胡适与 20 世纪上半期现代朝鲜文坛》勘误·····	金 哲 (38)
五周岁了——代编后记·····	耿云志 (39)

《胡适藏书目录》序

耿云志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邹新明先生告诉我，在该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合作之下，两岸学者终于完成《胡适藏书目录》的编纂。此书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致力于胡适研究的学者和致力于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会格外感到高兴。

我同新明先生相识约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北大参加蔡元培研究会的理事会，得机会认识了新明先生。当时他告诉我，北大图书馆已把整理胡适藏书的事情提上日程，他将主要致力于此项工作。此后，我们常有联系，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这些年来，他曾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胡适藏书的有关情况。其中有几篇曾在我主持的《胡适研究通讯》上发表，我有很深的印象。

这本藏书目录，不但其藏书种类繁多，数量非常可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图书，胡适都认真读过，留下一些批注文字和圈画过的痕迹。有些还附记该书的来历及相关故事，读者可借以了解胡适的行实，与朋友交往的情况，以及胡适的某些见解。此书编者特别细心地将这些信息都为我们钩稽出来，读者阅读此书目，不仅可以了解胡适先生藏书的情况，而且可以知道许多从前不知道的与胡适相关的传记资料的线索和珍贵的学术信息。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读者特别感兴趣的。

胡适留学回国的最初几年（1917—1920），没有日记。但他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书却留下一些有关的记录。如，胡适回国第一年，1917年7月至年底，半年时间里，胡适自己购买和朋友赠送的书中，以关于“小学”方面的书居多。有钱玄同赠的章太炎所著《文始》，自购《小学钩沉》、《广雅疏证》、《钦定清汉对音字式》，马裕藻赠《说文通训定声》，胡翼谋赠《说文管见》等等。这说明胡适初回国，特别致力于充实自己“小学”方面的知识及功力。胡适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国内首发那篇鼓动文学革命的《文学改良刍议》时，故意避去“革命”的字眼，并强调“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些话，并非客套，乃胡适真实心理的反映。胡适深知自己的“小学”功底不厚，要在国内学界于旧学方面取得话语权，必须在“小学”上，狠下一番功夫。

在这四年中，朋友赠书很多，就中以高一涵较突出，他与胡适既是同乡（皆皖南人），又曾同租一处房子，又同在北大教书，关系颇为密切。他先后赠胡适《朱子大全》、《二程全书》各一部，后来他还与王征（字文伯）一起在东京替胡

适买得《佛学大辞典》。还有钱玄同、马裕藻、吴弱男等也曾不止一次赠书给胡适，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北大两位青年俊彦，傅斯年、罗家伦也有赠书给胡适。而罗家伦在赠书题记中诚恳地说，胡适“是三年来影响我思想最大的先生”。这些从藏书中透露出的信息，很可使读者对胡适先生的治学与交友，有进一步的了解。

人们都知道，胡适先生也多次强调，他的思想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极大。这一点在胡适藏书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据新明先生说，胡适藏书中，他仔细阅读、圈画并注有批札文字的，有17种之多。学者欲研究胡适和杜威的思想关系，应可从这些藏书中得到不少有用的资料。

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得大名，成思想解放的先锋，又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古小说考证等学术领域多有建树。不但国内学者与之频繁交往，海外治中国学的学者，即所谓汉学家，亦多与胡适相交往。这在胡适藏书中亦得到充分反映。新明先生在整理胡适藏书过程中，注意到这一点，曾有专文论及。邹先生列举十九位海外汉学家有赠书给胡适。胡适都留有题记。有的还有赠者的附言。把这些与胡适日记对照看，可以增加了解。

有些藏书还为我们留下深入了解胡适思想见解的重要信息。如在一本美国人写的综论美国参战前的外交政策的书 *Peace and war (1931—1941)* 的扉页上胡适自记道：“范旭东先生于民国廿九年底来美国，他问我的外交方针；我对他说：‘苦撑待变’四个字。变在人，而苦撑在我，我们只能尽其在我而已。范先生赞成此言，所以他回到重庆就托人刻了这个图章寄给我。我从来不曾用过这个图章；今天读这本书，第一次用这图章打在书册上。”这段话是写于1943年的11月5日。后来，于1947年的6月5日，胡适又在书的内页上加写道：“此书所搜材料，初看似甚完全，但实有故意隐讳的地方。如1941 November 21 Secretary Hull 向A、B、C、D四国（指英、荷、澳、中四国——引者注）使节提议的缓和日本办法，此书全不提及，但有November 26的方案而已。又如中国方面的文件，此中一字不载。信史谈何容易！”前一段记载说明范旭东先生为胡适先生刻“苦撑待变”图章的来历，及胡适所说“苦撑待变”四字的含义。后一段记载则说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一段经历，并表示他对美国一部分政客和一部分学者歧视中国的态度的不满。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

胡适留在大陆的藏书，主要集中在北大图书馆，但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图书，藏于其他地方，例如原北京图书馆（今名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胡适收藏的由周叔弼先生赠给他的《戴东原水经考次手稿》。胡适自从卸任驻美大使后，便一直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水经注》案的考证。此案戴东原是被告，有学者说他窃取了赵一清和全祖望的《水经注》研究成果。胡适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他花了二十

年时间，搜集相关《水经注》本，重勘此案。戴东原本人的著作自然是胡适极端重视的。胡适于1946年7月刚回国，在同记者谈话时就说，自己年来正集中注意力于《水经注》案的考证。此话传出，如同登了广告。有同好者，纷纷寄送各种《水经注》的版本。到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时，他手上已有四十余种《水经注》的本子。周叔弢先生的赠本是1947年1月送到胡适手上的。书中有周叔弢之子周一良先生在他父亲决定将此书赠给胡适先生后，于1948年8月5日写在书上的一封短信（我竟不知道，周一良先生何以不另纸写此短信？）。信中说：“上礼拜回天津，家父说，那本戴东原《水经》的钞本，他没有什么用。您既有兴趣，须送给您留供参考吧。但他颇想知道那本和李木斋（李盛铎——引者）藏的关系如何。希望您能便中见示！”胡适于1948年8月12日在这本书后写下《跋语》。胡适说：“民国卅五年八月，我才看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李木斋旧藏的《戴东原自定水经》一卷。我在八月里写了两篇文章，指出这稿本的重要。卅六年一月十（日）夜，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叔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我今年才得空写成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比较这两个本子的。简单说来，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李本的底本也是（从三十年本抄出的，后来又用硃笔加上了东原三十七年的修改本。……周本表示东原在乾隆三十年的见解，李本则是他在金华书院欲刻《水经注》时全部修改本，故与他后来自刻《水经注》最接近。……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这本子赠送给我，我写此跋，敬记谢意。”

《胡适藏书目录》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合作完成的。书中也包括胡适纪念馆所藏胡适藏书的目录。这部分书我从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幸由新明先生给我提供一些资料，使我对这部分藏书才有一点点了解。我的初步印象似有几点可注意。一，胡适次子思杜曾帮助他的父亲抄录《水经注》书稿，其中《全氏七校水经注》是胡适特别重视的一部书。胡适依据天津图书馆藏的“全氏五校本”校补这个所谓“七校本”。他曾写有《〈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3万多字的长文。就是这部书，胡适于1948年12月匆忙离开北平时，仅仅带走其中的第二至第十一册，而其第一册和第十二册，因入展北大校庆五十周年所办的“《水经注》版本展览”，无法随身带走。后来胡适曾努力设法将遗留北京的这两册书索回，但终未如愿。直到北大图书馆与胡适纪念馆合作编辑《胡适藏书目录》，才有机缘使分置两处的一部书有合璧的机会。这不但是胡适藏书中可资纪念的事，而且也算得上中国藏书史上一件令人感叹的事。二，胡适往往在自己收藏的他人著作上留下一些表示他的看法的题记。他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后记》之末，记道：“鲁迅此书是开山之作，有工夫，也有见地。但他举各书的例子，尤其是白话小说的例子，都很少有趣味的文字，往往都不够代表各书的作风。胡

适四四，二，七”须知，这是大陆正在铺天盖地地大批胡适的时候，胡适题在大陆新版的鲁迅的书上。我们早已知道胡适对鲁迅敬重而宽容的态度。但从胡适藏书中得此信息，不能不令人格外敬佩胡适先生的大气。鲁迅骂了他十几年，简直是骂得狗血喷头。而胡适对鲁迅，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还是私人笔记中，始终持以理性和宽容，实非常人可及。三，《目录》中，据本书编者推断，——我很赞成这种推断——有几种书是胡适先生 1948 年匆忙离开北平时带走的。它们中有我上面提到的《全氏七校水经注》和其他一些与《水经注》考证有关的书和稿本。另有胡适作过详细校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戴东原的哲学》、及 1919 年北大出版部铅印的《中古哲学史》的讲义等等。这给我一种印象，在那炮火纷飞的时候，仓皇出走之际，胡适最想带走这些书，反映出他极想偿还的学术夙愿：完成中国哲学史和《水经注》考证。然而，如所周知，这两项夙愿都没有圆满完成。我在不久前所写《梁启超与胡适》的一篇短文中，曾经感叹：“梁氏与胡氏其政治追求是大体一致的。梁先生追求宪政的实行；胡先生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这本藏书目录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而又非常重要的学术信息。为说明阅读胡适藏书对于治胡适研究和治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者的价值，略述我的一些粗浅的印象，聊供编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我非常高兴两岸学者完成《胡适藏书目录》的编纂，祝贺此书的出版。

2012 年 11 月 22 日 于容膝斋

梁启超与胡适

——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耿云志

今天的会，是谈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政治家，特别是政论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现代的时期，或者说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近现

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所以梁启超是一个过渡人物。他本人很清楚这一点。所谓过渡时代，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就是两头不到岸。

为了说明梁先生在这个过渡时代所起的作用，我想通过以他和比他晚一辈的胡适作比较，使梁先生的历史作用及其特点，显得更明晰一些。因为胡适也是这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胡适在评论当时学界人物时，曾明确地把自己划入与梁先生同属过渡性人物。虽同是处于过渡时期，但因其家庭、教育、及人生轨迹不同，而各显出不同的特点。

早在数十年前，就有人做过梁、胡两人的比较。就中以台湾的张朋园先生为最早。我本人也在 28 年前写过胡适与梁启超的比较文章。我今天不想全面、系统地谈这个问题，以免重复。我想就我从前的文章提到而未充分展开的两点，在这里再谈一谈。

中国过渡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

梁、胡两人都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努力做到中西结合。这是没有重大分歧的。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言论著作，可以发现，两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 28 年前我写的那篇《胡适与梁启超》一文中，我曾说到，“梁启超的旧学根底终究要比他的西学根底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而胡适则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统的西学教育与训练，使他牢固地形成一套西方式的观念论与方法论，旧学对于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

这就是说，两人的立脚点不同。

梁先生是以中国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学于我有用的东西。胡先生则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发展起来的一套东西应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的。所以他是以西方的标准来对待中国固有的东西，与西方的标准相合或相近的东西，就加以发扬，相反则毅然舍去或置之不问。

这一点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梁启超对此书的批评中看得最清楚。

胡适极端重视方法论，他认为西方之工业及各项事业，尤其是其科学、学术之发达，是由于他们特别重视方法论。他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也就特别把方法论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讨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先秦思想家、哲学家的方法论的，而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在此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梁启超虽并非完全不重视方法论，但他更重视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都特别重视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要撇开宇宙观与人生观，那就完全显不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所以，他对于胡适只重视方法论而不重视宇宙论与人生哲学，非常不满。他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书中“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

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肤浅或谬误。”

胡适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一个根本的估计，他认为，西方文化比我们自家的文化向前多走了一步，他们进入到近代现代，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中古的时代。所以，我们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既然要学人家，自然是要以人家先进的东西为目标，去仿效。仿效得多了，熟练了，再求创造。梁氏虽然也不否认西方的先进。但他认为，中国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可宝贵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学说，比西方人还要高明。我们学西方，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选取我们所缺的东西。至于人生观方面，西方还得向我们学呢。

两人都主张中西文化结合，但由于立脚点不同，实际上却发生很大的分歧。

梁氏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基准，觉得缺少什么，需要什么就到西方文化中去择取。时时都不忽视中国文化固有的基础。胡适认为，既然西方文化比我们先进，就应当以西方文化为基准，我们固有文化中仍适用的，就保留，就发扬，不适用的，就淘汰。这两种主张在终极目标上有一致性，但立身的基点，结合的具体取径很不相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说，梁先生的看法可能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心理，可减少一些学习西方文化的阻力。而胡适先生的主张，可能易于为青年人接受，在冲击旧网罗方面可能会发生一些震动的作用。但容易激起偏于保守的人的反感。

第一点就简单说这些。下面讲第二点。

梁启超、胡适两位思想家和学者年龄相差 18 岁，但在中国近代漫长的过渡期中，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遭遇到差不多相同的历史课题。而他们两位又都是极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以，救国、强国，也就是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发展之路，成为他们终身的追求。

但同样因为家庭、教育与具体的经历不同，而显现不同的特点。

梁、胡两人在思想文化上，在学术上，乃至在政治上，既有前后相继的一面，也有互相交叉的一面。梁氏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奔走政治，是政论家，也是政治活动家。但他又是一位学者，在思想学术上颇多贡献。胡适一生，则绝大部分时间都活跃于教育、学术舞台上。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但他有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政治冲动，也时常发表政论甚至偶尔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但时代的艰苦，令人不能不唏嘘感叹的是，梁启超的退而从事学术，和胡适的进而谈政治，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无奈的选择。

先看梁启超，

他于 1914 年辞去政府职务，避居天津，第二年创办《大中华杂志》，在发刊宣言中梁氏表达出对政治的极端失望。他说：

“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

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

接着说：“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故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谈，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谈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

本来梁氏已下决心，从政论舞台上退下来，用心于思想学术活动。后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乃不得不出而参加护国运动。再后，又有张勋复辟，梁氏又不得不再度为维护共和奔走。因有大功于护国事业，乃一度再加入政府。但不久即再度对政治失望而退居天津。自 1919 欧游之后，梁氏彻底退到学术圈内。

还在出国欧游之前，1918 年夏，梁先生即已考虑“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治。”到是年 10 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出游欧洲前夕，梁氏与他的几个晚辈朋友作竟夜长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对以往政治活动忏悔一番而后，得出结论要从思想学术上为国家社会尽力。

再看胡适。

胡适于 1917 年夏归国。归国之前，他早已下定决心，要用笔和舌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以偿报国之志。归国之际，看到国内情形，更加坚定了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上为改革政治打下基础的决心。从 1917 年到 1922 年，这中间，虽偶作政谈，但并未改变其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1919 年发表“问题与主义”的三篇文章之后，两年多时间仍坚守其学术园地的耕耘。到 1922 年夏，他终于感到不得不谈政治。这一年他与朋友合作办起《努力周报》，有人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他应该尽瘁于思想学术，不当谈政治。胡适写文章说他的苦衷。他说，他回国两年，一直不谈政治，直到 1919 年夏，陈独秀被捕，接办《每周评论》，才有不得不谈政治的冲动。于是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但短暂的辩论过后，胡氏仍然做他的学问。以后两年多，并没有多谈政治。但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舆论界实在非常不满意。大家都撇开具体的政治不谈，而高谈各种主义。他说：“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人们尽情高谈各种主义，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失败，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胡适“实在忍不住了”。他说：“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我们姑且不论胡适对当时舆论界的评论是否公平、恰当。我们从中确可以看出，胡适是被刺激不得不出来说政治。梁启超因对政治失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有些近乎迷梦而反省，从而退出政治舞台，改而从事著述。胡适是对政治舆论界极端失望，而决心部分地离开学术而出来说政治。两人一退一进，确是在大体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发生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因时代的迷误，社会的混乱，使一个久在政治界活动的杰出的政治宣传家，因对现实政治失望而不得不退而研究学术；同时却使一位本打算二十年不谈政治，悉心尽瘁于学术的学者不得不出来说政治。这是时代的吊诡。

梁氏与胡氏其政治追求是大体一致的。梁先生追求宪政的实行。胡先生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2012, 10, 24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研讨会开会词

耿云志

尊敬的中山市的各位领导同志，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诞辰 146 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崇高敬意，来到这里，追怀他的伟大志业，探究他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这既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数十年来，孙中山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他的伟大志业与不息的奋斗精神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他的思想文化遗产仍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这个问题从前虽然有人提过，但不曾集中地、深入地讨论过。现在，全国各地，乃至凡有华人居

住的地方，国学热与西学热都在升温，甚至发烫。在这种时候讨论有关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的问题很有意义。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生中，有时谈论西方文化多一些，有时，特别是晚年，谈论传统文化多一些。但他在谈论西方文化时，并没有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他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并没有忘记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一部分头脑清醒的先觉人士，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差不多都坚持中西结合以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大原则和大方向。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或因其传统文化的根底太浅，或因其对西方文化没有真知，以致不是迷醉西化，就是深陷传统的迷宫中。这值得我们大家引起高度关注。

我个人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循着世界化和个性解放这两个基本趋向前行的。这一点如果说在近代的前期，还彰显得不很清晰的话，那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显得清晰得多了。所谓世界化就是开放主义，就是没有人为障碍地去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于我有利的东西，同时也没有人为障碍地将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我们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一起分享人类文化的成果。所谓个性解放，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同时为社会作贡献。我们认清了方向，自觉地向这两个方向努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

各位朋友，

这次会议，得到中山市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会议所有的物质条件。而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鼓舞，我们要尽力把会议开好，以报答中山市领导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这次研讨会，虽酝酿较久，但形成定议较迟。大家得到会议正式通知的时间较晚。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积极撰写文章，赶来参会，这是本会得以顺利举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此，我诚恳地向大家表示谢意。

我还必须提到，由于我们的老朋友王杰先生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朋友们紧密合作，夜以继日地辛劳，充分做好了会议的一切准备，我们才能如期地在这里举行会议。所以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预祝大家在这里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先生于11月12日在广东中山市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46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致开会词。）

《胡适文集》前言

朱 正

一

胡适 1922 年 7 月 10 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瓠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杜甫，这些唐代诗坛上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的历史地位渐渐被后起的群星所取代。一本一本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最终也逃不了赵翼所说的这个规律。

胡适是 1962 年 2 月 24 日去世的。五十年前，在胡适离开人世的时候，立了一个墓碑，碑文中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样盖棺论定，当是当之无愧的。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就在全社会接受这一份丰厚的遗产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作一回盘点：其中哪一些是最应该珍视的，哪一些是不必怎样重视的。

二

胡适出生的时候，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全国。又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一些最先觉悟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外国的文化、思想中确有比我们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要优长的地方。严复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宣传介绍外国的历史、人物、思想、学说等等，都对于推动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十三、四岁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的时候，就得读《新民丛报》，得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了。他从这里最早得到了日后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从当代大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

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这样介绍杜威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東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惯用的方法。

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满族统治集团，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为后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开辟了可能性。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很觉兴奋。他在1912年年初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胡适是“五四运动”前夕开始他的事业的。“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历史正要发生大转折的时刻。他和蔡元培、陈独秀，以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就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用浅近的古文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是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所主张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些方面，很快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年之后在小学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已经没有了文言文的地位。他介绍易卜生主义的用意，曾在回答读者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一篇中的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是以外国先进文化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就是提倡全盘西化的运动。”而胡适，确是正面表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过：“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其实在

五四诸贤中并不是只有胡适有这样的主张。像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1915年9月15日）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注：白种人）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还有鲁迅，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四十六里又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 Apollo。”从这里人们看见，鲁迅也是属于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人。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他说的“全盘”一语的意思作了一点解释和澄清，说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更举例解释说：“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我觉得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好。因为“普世价值”明确地划定了“化”的范围，或迎或拒，都有个标准。我们就把他说的“全盘西化”理解为“普世价值”好了。

胡适表示了“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批判。可是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的任务。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之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

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有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在这一方面，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煌煌巨著《说儒》就是他整理国故的一项成绩。对于旧小说的研究方面，他更做出了很多成绩。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宋人话本八种》等等，都写了好些十分精彩的考证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所用的方法，足有示范的作用。只是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很少几篇。胡适 1943 年 5 月 25 日致王重民的信里，也说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三

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思想、文化、文艺方面的。但是正如他在《我的自述》（1922 年 6 月 16 日作）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每周评论》创刊时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他在 1922 年 2 月 7 日日记中回忆说：“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成因，后来他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直到 1919 年 6 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 31 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共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政府”的口号，包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这些项目。

这一同签名的十六人中后来有三人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总长。对他们入阁之后的实际作为，胡适感到失望了。他 1922 年 10 月 27 日的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

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每周评论》(后期)、《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刊物，胡适既是编者又是最重要的作者，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当时不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哪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立刻作出反应。当年他所评论的这些时事，现在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这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能选录很少几篇。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兴趣的人，请读原刊好了。

胡适 1929 年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拥护人权的文章：《人权与约法》、《〈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这些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先知”孙中山。针对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这种提法，胡适批评说：“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如《大纲》第廿五条说：‘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永无“告成”之时。故中山先生之宪政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智者千虑之一失了。”（见《〈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蒋介石，提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的事。这些文章在《新月》月刊上陆续发表的时候，就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了。胡适 1930 年 2 月 15 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道密令的内容：“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嫫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1930 年 2 月胡适将这些文章加上梁实秋的一篇和罗隆基的三篇，辑印为《人权论集》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他在为《人权论集》写的序言中，引用了周栎园《书影》里的一个典故：“昔有鸚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鸚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把自己做这些文章比做鸚鹉救山火一样，不过是尽一点自己的心：“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这话说得十分动人。

胡适的政论作品中所宣扬的主张，许多方面都是前后一贯，少有变化的。只

是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前后有很大的变化。1926年7月，他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途经莫斯科。他当时在《晨报》发表的给友人张慰慈的信《一个态度》中，说了他对苏联的观感，说：“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可见这时胡适对苏俄这“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是持赞许态度的。可是他1948年1月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还有些人觉得这个侵略势力可能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因为他们本钱比德日还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还更伟大，他的势力比德日极盛时还更普遍。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我抛弃了二十多年对苏俄的梦想，我自己很感觉可惜。但是我观察这几年的国际心理，这样从殷勤属望变到灰心，从爱护变到害怕忧虑，恐怕不止是我一个人。即如老兄，难道你真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吗？”二十多年过去，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1926年他对苏联“政治新试验”的赞许，是说出了个道理来的，当时至少能够得到左倾人士的赞同；1948年他说苏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当时的左倾人士就会说他反动了。在这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政治新试验”以失败告终之后，当年他说的这些也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他留下了好几种哲学史的著作。从体例说，这个选本不能收整本的书。而且就价值而论，这些也并不是胡适本人最重要、最成功的作品。

四

现在我们是给胡适编选集。其实他自己曾经编选过一本《胡适文选》，选了二十二篇文章，都是他认为最重要、也最希望读者阅读的文章。这是1930年选的，这以后他还写了很多重要文章。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

年 12 月 29 日条) 所记: “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 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 可以收入第二集里。” 所以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 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 年 10 月 23 日条) 里记下: “先生看了孙德中选的先生文选的目录, 说: ‘像《丧礼的改革》、《贞操问题》, 这些几十年前提出的社会问题, 现在连影子也都没有了, 很少人实行的。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方面。你们都不读我的书, 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 这里胡适提出了一个有的文章失了时效的问题。经过几十年时间, 社会风气和人们的观念都有了不小的变化, 当初胡适必须呼吁的丧礼的改革和妇女的贞操问题都已经不成问题了。这一类文章就不再有必要选录给今天的读者看了。

这一部选集是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 44 卷本《胡适全集》为工作底本。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改正了工作底本的一些错误。台湾出版的《胡适文集》当是收文更全的, 可惜不曾见过, 这里仅从台湾出版的一种选本中编入几篇晚年的文章, 现在的这一本不问而知是有欠缺的。至于作全面补充修正的机会, 我想, 还是留待将来罢。

2012 年 10 月 15 日 朱正于长沙

(《胡适文集》, 2013 年 1 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胡适文集第一卷

(朱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胡适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邹新明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以下简称《五德》) 是顾颉刚讨论古史的重要著作, 被认为“是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体系所作的一个精辟的解剖”。^①又有学者将其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并列为作为“古史辨派”主将的顾颉刚的两个主要论点。^②

① 刘起釪:《古史辨派的掌旗者》,《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11月。

② 杨向奎《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论文集》,第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五德》是顾颉刚应清华杨振声之邀为《清华学报》所作，是其《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所论“帝系考”的扩展，作于1930年2月底至6月初，历时三月有余，其间曾患病数日，“至目不能张”，为作此文白发愈多，“几成斑白”。^①可见顾颉刚对此文的看重和倾注心血之多。

然而，促使启发顾颉刚走上疑古道路，此前对其古史讨论颇多赞赏支持的胡适对此文却评价不高。《五德》1930年6月刊载于《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同年10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述之说，殊不可晓。”^②

关于《五德》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关系，顾颉刚在《五德》中也提到：“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③

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前，顾颉刚的《五德》在后，并且据钱穆《师友杂忆》，钱穆此文是顾颉刚为《燕京学报》约的稿^④，顾颉刚在读到钱穆的论文后，仍相信今文学家的论断，因此胡适觉得“殊不可晓”。

钱穆后来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指出：“顾先生那篇文里，蒙其采纳我《刘向歆王莽年谱》里不少的取材和意见，而同时顾先生和今文学家同样主张歆莽一切的作伪。”^⑤“顾先生原文所引各种史料及疑点，均可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说明，不必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于刘歆一人。”^⑥顾颉刚弟子后来在评价《五德》的时候也对此表示惋惜：“运用历史演进及传说流变的眼光来研习历史，正是顾先生所擅长，因为它符合旧史形成的实际情况，因而是正确的。现在顾先生舍弃自己这一正确方法，却轻于相信清末今文家并无确证的主观臆说，确是有失慎重。”^⑦胡适对《五德》的失望，大致也是在此点上。

胡适与顾颉刚由亲到疏，对古史的看法由相近到相左，以及胡适对《五德》评价不高已经是胡适研究者共知的事实。就笔者所知，胡适关于《五德》的公开意见，仅见于其1931年4月1日给钱穆的信，后来以《论秦时及周官书》刊载于《古史辨》第五册钱、顾两人关于《五德》的讨论之后。在这封书信中，胡适

① 顾潮：《顾颉刚年谱》，1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② 《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350-35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

③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39-140页。

④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⑤ 《古史辨》第五册，第6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⑥ 《古史辨》第五册，第6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⑦ 刘起舒：《顾颉刚先生学述》，1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5月。

讨论了顾颉刚反驳钱穆的一个重要论据，与钱穆一样，认为不能成立。除此之外，胡适对于《五德》的一些具体看法，则不得而知。

幸运的是，笔者在整理胡适藏书时，发现了胡适当年日记中提到的所读顾颉刚《五德》的《清华学报》单行本（即抽印本），在《五德》篇末，有胡适题记：“十九，十，廿八，定生船上，胡适之。”和“十九，十，廿九，胡适之。”结合胡适日记，胡适10月26日在天津登船，30日到上海，《五德》是胡适10月27-29日在船上读的。胡适在这个单行本上留下了不少批注圈划，这可以使我们对胡适评论《五德》有更具体深入的认识，同时对于分析胡适与顾颉刚的学术分歧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笔者在此略加整理说明，以飨同好。

据《顾颉刚年谱》，《五德》“专门研究王莽时代的五帝说。文章详论了西汉末年出现的《世经》一书如何将战国后期邹衍所创之五德相胜说完全改变为五德相生说，如何改造汉代以前的古史系统将其向上伸展了两倍。认为《世经》‘是中国上古史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件，二千年来的传统的上古记载以及一班人的上古史观念，谁不受它的支配！’并认为此书是刘歆所作。文章根据汉代的时势指出，王莽为做皇帝，手段是在历史中找出他做皇帝的根据，而刘歆由于整理皇家书籍，欲藉政治力量来表章所发现的古代史料，必在其中加进有利于皇帝的东西。”^①《五德》还认为，“古文”和“古文经”的大规模学术运动，都是由刘歆造成的，并且《左传》中也有不少刘歆的作伪。

《五德》全文二十四章，十一万言，胡适的批注主要集中在前半部分。

顾颉刚在《五德》第一章“五行说的起源”中引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关邹衍的记载，接下分析说：“邹衍是荀子以前的人，他的学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他的学说是以阴阳五行作基础的，他的学说是‘滥’，是‘怪迂’，是‘闳大不经’，有类于‘僻违’，‘幽隐’，‘闭约’的，为什么《非十二子篇》里不一提他的名字呢？”^②胡适在“为什么《非十二子篇》里不一提他的名字呢？”一句下划线，并批注说：“此言最可思，《非十二子篇》似不可信。《韩诗外传》只有十子。”

顾颉刚接下来推测“我很疑邹衍亦儒家”，并且举出四条论据。然后做出大胆推测：“如果这个推论不错，我敢作一假设：《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邹衍所造。”顾颉刚假设的论据是鲁邹齐三国文化接近；孟子是邹人，邹衍以邹为氏，当也是邹人；邹衍在孟子后，吸纳孟子学说，并加以齐人常有的浪漫色彩，自成一派，因此顾氏认为“孟子与邹衍因地方的接近和思想的一部分类同，因而在传说中误合为一人，”^③胡适在顾氏的假设“《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

^①顾潮：《顾颉刚年谱》，1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②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75页。

^③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76页。

孟轲即是邹衍所造”下划线，并在此段旁批曰：“此段最弱。”笔者认为，从顾氏此段的论证来看，可以说有些牵强附会，不太让人信服。“大胆假设”是有了，但“小心求证”则不够。

第二章“邹衍的略史及其时代”中，关于邹衍的时代，顾颉刚引述了《史记·燕召王世家》，《平原君虞卿列传》下《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等记载，总结说“是邹衍曾与梁惠王，燕昭王，赵平原君发生过宾主关系。”^①接下来以“适之先生驳之云”引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邹衍时代的考证。胡适于此段旁注道：“此说我已自己推翻了。”

第六章“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顾颉刚在讨论三统说时，指出“三王，五帝，九皇，都不是固定的名称而是推移的名称，好像亲属之有高祖，曾祖和曾孙，玄孙一样。除此之外，又有所谓‘四法。’四法之名是夏，商，质，文（夏商不是代名，乃是两种法制的类名。）”^②胡适在“四法之名是夏，商，质，文”一句下划线，“夏商不是代名，乃是两种法制的类名”两句各划叉，表明胡适不认同夏商是两种法制的类名。

随后顾氏根据董仲舒的学说列出五德说与三通说对照表，为方便说明，照录如下，其“附记”一列省去：

代 次	五德说	三统说
夏前一代	土德（尚黄）	赤统 法商
夏	木德（尚青）	黑统 法夏
商	金德（尚白）	白统 法质
周	火德（尚赤）	赤统 法文
周后一代	水德（尚黑）	黑统 法商
周后二代	土德（尚黄）	白统 法夏

胡适在夏前一代及夏代对应的三统说栏划叉，并批注：“岂有‘夏’前‘法商’之理？”表明胡适不认同顾氏“夏商不是代名，乃是两种法制的类名”的说法。

表格之下，顾颉刚解释说：“在这个表里，两说相同之点显现得最清楚的是商、周及周后一代，颜色完全一样。……所以我很疑心三统说是割取了五德说的五分之三而造成的。董仲舒在此文中所以只敢从‘汤受命而王’说起者，正因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说一致，凡五德所摆布下的符应和制度，大可取作三统说之

①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78页。

②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00页。

用而不见其矛盾。若一说到夏，则一边青，一边黑，就要惹人疑惑了。”^①

胡适在此段“三统说是割取了五德说的五分之三而造成的”，“正因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说一致”，“若一说到夏，则一边青，一边黑，就要惹人疑惑了”三句下划线。并在“三统说是割取了五德说的五分之三而造成的”一句右侧空白处打有问号，“正因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说一致”一句右侧空白处打有问号，并批有“无稽”二字。胡适还对“董仲舒在此文中所以只敢从‘汤受命而王’说起者”一句批注：“此因商变夏，故从商说起。夏=文，商=质，周=文。此中并无‘四法’，只有文质。”可以认为，与前胡适否认“夏商不是代名，乃是两种法制的类名”的看法相一致，胡适认为只有“文”、“质”二法，没有“四法”。

顾颉刚在随后讨论汉人有“孔子为汉制法”的说法，把秦踢出三统之外时，指出这不是他自己的“有意文致”，而是有据可查的。他引证了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赞：“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得天统矣。”^②胡适在此段右侧划有竖线，并批注：“此是‘忠敬文’三统说，与仲舒《对策》略同。而与《繁露》《质文》篇之二统说不同。”

接下来，顾颉刚引用《汉书·律历志》，说明汉初历法混乱，所以三统说有“汉应为寅正”的主张：“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肤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③

胡适在此段左侧空白处批注：“此是尚黑，但只是太初以前之制度。”

第八章“《世经》以前的古史系统”，顾颉刚根据各种记载列出了“夏以前的帝王表”，并指出，炎帝虽然常被人称道，但除了《封禅篇》以外却再没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统。之所以这样，顾氏的解释是“只因以前说为他子孙的国家，如申，吕，如齐，许，都早亡了，没有人替他争地位了。而帝嚳后之周，宋，晋，鲁，燕，吴，颛顼后之秦，赵，楚，越，田齐，在战国时，或保持其旧国，或正作新的发展，祖先的地位就靠了苗裔的势力而不坠，而扩大。”胡适在此段左侧空白处，打了问号，并在“以前说为他子孙的国家”、“帝嚳后”、“颛顼后”三处下划线。此似表明胡适对顾颉刚的此番解释不是很认同。

第九章“汉帝应让国说及再受命说”，胡适在此篇名右侧空白处批注：“注意

①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01页。

②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03页。

③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04页。

《应同篇》说：“水德至而不知，将禅于土。”按：《应同篇》为《吕氏春秋》之一篇，此批注似是指出顾颉刚忽略的一条材料。

同样在第九章，顾颉刚讨论在天下怨愤的情况下，一班五德三统论者依据自己学说主张易姓受命时，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是眭弘，此人根据大石自立、枯柳复生等异象，上书主张汉帝禅让帝位。顾颉刚说：“不过既经据了天位的人，哪肯轻易让给人家，所以眭弘就以妖言惑众之罪伏诛了！”^①胡适在此段旁批注：“此是臆断。当时霍氏当国，此议大有阿附霍氏之嫌，故《弘传》云：‘大将军霍光恶之’，此可见当时人也知道眭弘之意在于暗示拥护霍光，故霍光不自安而诛弘。岂是‘据了天位的人’所为吗？”

顾颉刚在第九章末总结说：“我们看了这一章，可以知道：自武帝好大喜功，弄得四海困穷之后，人民已不愿汉家再居天位。眭弘、盖宽饶提出禅位贤人的办法，汉帝大怒，他们都被杀了。”胡适在此段旁打了问号，疑问当与前面所说“臆断”同。

第十章“五行相生说”，顾颉刚在讨论汉人所说发屋得古书事三次的不可信时，就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得《说卦》一事，引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发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喜《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伪经考》卷三上）”^②

胡适在此段旁批注：“此何足证？”表明不认同康有为的推断。

顾颉刚在后面讨论五行与八卦一致时，举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集干宝《易注》所引《火珠林》所载《八卦六位图》，说明八卦虽有八个，但乾兑合为金，坤艮合为土，因此八卦就是五行了。胡适在《八卦六位图》旁批注：“此以方位重定五行，故兑为金而震为木。”

顾颉刚认为，自从八卦与五行合二为一，《说卦传》又说“帝出乎震”，于是想把五行相胜说的历史系统改造到五行相生说系统内的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他引《汉书·郊祀志赞》：“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③胡适在旁批注：“相生”。

第十一章“汉为火德说及秦为金德说”，顾颉刚引《汉书·高帝纪》关于刘邦斩白蛇，有老嫗哭泣，称白蛇为白帝子，刘邦为赤帝子的故事。指出此与五德相生说的矛盾：“为什么秦会成白帝子了呢？秦不是自居于水德的吗？西汉定为土德，不是也承认秦为水德吗？水之色黑，为什么秦竟成了白帝子？白为金德之

①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28页。

②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44页。

③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47页。

色，为什么秦是金德？五行相生之序，生火者为木，秦既列在汉的火德之前，为什么不改成了木德？”顾颉刚接着分析说：“这个缘故很不易解释。据我看来，这是仍用五行相胜说的。因为秦为汉灭，火胜金，汉既为火德，秦自当为金德了。”

①胡适在“仍用五行相胜说的”一句下划线，并在旁批注：“未免太矛盾罢？”

而顾颉刚自己在后面也解释说：“读者们看了这个解释，不免要问：汉之为火德是由相生说来的，在相生说的系统中，如何容得下相胜？对于这个驳诘，实在无法解答。我想，这或者是刚在改变五德系统，尚未成为定论的时候所出；一经沿用，后来就没法消灭了。或者那时曾有一个参用相胜和相生说的系统，看其得国以禅让则用相生的系统次之，若其得国以征伐则用相胜的系统次之。只因那时的五德史说传下来的太少，我们无从判别。”②

接下来，顾颉刚根据《封禅书》所列，秦地上帝祠在秦有六个，在汉有七个，但是《封禅书》又说秦时的上帝祠只有“壅四時”而无六時，汉时又只有“壅五時”而无七時，认为西時、畦時是西汉末期人伪窜的。他对西、畦两時因为地位次于其他诸時，因此皇帝不亲往祭祀的说法提出反驳：西時是秦国第一个時，畦時在许多時中最有符瑞的意味，为什么地位会低呢？同样祠白帝的鄜時为什么不降低？胡适在此段空白处批注：“白帝有三時，故五時中只留其一，而不全废其二。”

接着，顾颉刚又举《汉书·郊祀志》所载匡衡奏请罢壅五時来进一步证明西時、畦時是西汉末期人伪窜的。顾颉刚认为，引文中匡衡请罢的時，“只说秦侯以意所立的鄜，密，上，下四時，和汉未定天下时所立的北時，放过了西時，畦時。难道他要废去五時而独留这两个時吗？这大足证明这两个時本来没有，所以他不说了。”胡适在此段空白处批注：“此真‘作茧自缚’。汉祠五帝于五時，故匡衡论郊祀时只论五時，而不及余二時。西時、畦時本来‘上不亲往’，不在‘郊见’之列，故不及也。”

按：关于秦时的上帝祠只有“壅四時”而无六時，汉时又只有“壅五時”而无七時，顾颉刚认为是西時、畦時乃西汉末期人在有了“赤帝子斩白帝子”之后伪窜的有力证据，也是他与钱穆讨论《五德》，所写《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一条重要反驳论据。钱穆在顾颉刚此文的后面附注：“秦祠白帝有三時，我不认为伪，有详说见近著《周官著作年代考》，容后续布。”③胡适同样不认为西時、畦時为伪窜，具体论证上与钱穆不同。在上文提到的写给钱穆的《论秦時及周官书》中，胡适说：“秦祠白帝之三時，以民俗学眼光去看，绝无可疑。西時在秦民族东徙之前，其牲用马，沈钦韩指为‘循西戎之俗，’其为

①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49页。

②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50页。

③《古史辨》第五册，第6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民族之神甚明显。《封禅书》但说‘居西’而不能指为何地，但必不在雍则甚明。东徙以后，西峙似废了。畦峙在栌阳，汉属左冯翊。雍四峙皆在雍，汉属右扶风。两地相去甚远，故举‘雍四峙’自不包雍以外的二峙。况白帝已有鄜峙，自不必并存二峙了。白帝有三峙，正可证明白帝本是这民族的大神。”^①

顾颉刚后面又说《郊祀志赞》说：“高祖……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这一件事是《本纪》中所未见的。胡适在此句旁批注：“？此见《本纪》高祖起兵时。”按：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沛县起事，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②可见胡适所记不误。不过顾颉刚在前面提到的引用《汉书·高帝纪》刘邦斩蛇，圣母夜号故事时，自注：“《史记·高祖本纪》也有此事，但司马迁时不能有此故事，必出伪窜。”以顾颉刚对古代典籍之熟读，不致出现这样的错误，只能是因为他认为此类记载都属于后来“伪窜”。

顾颉刚接着指出，《封禅书》中记载刘邦立为汉王，“色尚赤”，汉文帝郊见壘五峙祠，“衣皆上赤”，但是汉武帝郊拜太一，泰山封禅，都是“衣上黄”，“是何等地冲突呵！”^③胡适在此句下划线，并批注：“此有何冲突？武帝时土德之说已胜，故尚黄了。”

此段后顾颉刚说：“汉既以居火德而色尚赤，同样，秦亦当以金德而色尚白。是以《封禅书》云：秦并天下，……三年一郊，……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④胡适在“而衣上白”一句下划线，并批注：“此也不足怪。秦虽改水德，而郊见上帝则循旧俗，用白色。白色者，乃秦民族之色也。黑色者，乃新政之帝国服色也。”

第十四章“今古文问题”，顾颉刚指出刘歆引武帝诏书，“《史记·儒林列传》所载的为‘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此间却说‘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为要证明《六经》的不完全，不惜杜造了‘书缺简脱’一语增加进去。”^⑤胡适在“不惜杜造了‘书缺简脱’一语增加进去”一句下划线，并批注：“太初改元诏‘书缺乐坏，朕甚闵焉’，引见上文 p. 98。不得说是他‘杜造’。”按：查《五德》第 98 页，引《史记·历书》，有“书缺乐弛，朕甚闵焉”之语，虽与胡适所记略有出入，但确是存在的。

在第十四章末，顾颉刚在引用康有为《重刻伪经考后序》后，说：“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伪经考》这书，结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

① 《古史辨》第五册，第 63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②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 350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③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 155 页。

④ 同上。

⑤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 183 页。

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①胡适在“我深信一个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一句下划线，并批注：“怎么讲？”

以上是胡适评价批注《五德》的大致内容，虽然有赞同、解释、引申者，但多数属于怀疑甚至批驳。笔者认为，胡适对顾颉刚一些论据、结论的批评反驳，除了个别是由于胡适与顾颉刚的预设前提不同而导致的，多数还是有理有据的。

据《顾颉刚年谱》转引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29年3月14日顾颉刚由杭州到苏州，后来由于中山大学的事到南京、上海数日，其间拜访了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适对他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②此或许是胡适关于他与顾颉刚对古史认识发生歧异的较早表白。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还提到，1930年2月初，胡适与钱玄同分别致书顾颉刚，对顾氏《上古史研究讲义》中的《易传》一章进行讨论，钱玄同认为“精确不刊”，胡适则认为，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应该推翻，顾氏认为此是他与胡适在学术上“发生分歧的开始”，^③而此后不久胡适对《五德》的失望与驳诘，则可认为是二人学术分歧的深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胡适与萨本栋通信时间考

董立功

胡适与萨本栋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胡适1891年出生于安徽绩溪，萨本栋190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两人相差十一岁。当胡适1910年夏考取清华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官费生时，萨本栋还只是一个年仅八岁的孩童。当1917年26岁的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时候，15岁的萨本栋只是一名清华学校的学生。但若干年之后，二人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某种联系。1922年，20岁的萨本栋赴美留学。1928年，26岁的萨本栋学成归国后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这与胡适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年龄相同。

胡适和萨本栋的人生轨迹在1937年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交集。据谢泳先生在

^①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单行本，第191页。

^②顾潮：《顾颉刚年谱》，1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③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1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其《胡适与厦门大学》一文中研究，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转为国立。厦门大学本拟聘胡适当校长，被胡适婉拒。^①7月5日，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致电福建省主席陈仪，决定聘任萨本栋为厦门大学校长^②。年仅35岁的萨本栋受命出任转为国立后的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萨本栋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卢沟桥事件爆发，时局急转直下。萨本栋于7月11日离开清华大学，南下赴任。7月25日抵达厦门大学，于7月27日正式上任。^③为确保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萨本栋经请示教育部，将厦门大学内迁至闽西长汀继续办学，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艰苦卓越的办学历程。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也于7月8日离开北平南下，11日到庐山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庐山谈话会”，7月28日又到南京，8月13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9月15日又至美国从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一年后的1938年9月7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时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及各所陆续迁回南京，而胡适和萨本栋的人生再次出现交集。胡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而萨本栋则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此时二人交往颇多，二人的书信联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

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未收录胡适与萨本栋二人间的通信。书中的“编辑说明”也许解释了未收录的原因：“本书正文部分收入胡适自1915年到1948年的一部分来往书信，其中包括一部分电报和信稿、电稿；……胡适的论学书信以及其他专题书信将另行编辑，本书未予收入。”^④

耿云志先生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有萨本栋致胡适的信八封。因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是采用影印形式出版，一般读者辨识起来有些困难，所以谢泳先生在程巢父先生的帮助下对《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萨本栋致胡适的八封信进行了整理。^⑤据笔者统计，萨本栋致胡适的八封信中，有两封同时署了年份和日期；有三封署了日期，但未署年份；有三封年份和日期均未署。

耿云志、欧阳哲生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胡适书信集》（中册）收录了胡适于1947年4月28日、5月22日、7月9日致萨本栋的信三

① 谢泳：《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51-270页。

② 参见《关于聘任萨本栋为厦大校长的来往电》，载《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9页。

③ 孙敦恒：《萨本栋传》，载陈武元编：《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9页。

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⑤ 谢泳：《胡适与厦门大学》，载《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56-261页。

封。^①三封信的内容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有关事宜。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收有胡适致萨本栋的信四封。这四封信除了致赵元任和萨本栋的一封信没有署日期外，其余三封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胡适书信集》（中册）中收录的三封信内容相同。

总之，在笔者能看到的公开出版的有关胡适书信的四种出版物中，总共收录了胡适与萨本栋通信十二封，其中萨本栋致胡适的信八封，胡适致萨本栋的信四封。萨本栋致胡适的八封信中有六封未署时间或时间信息不全，而胡适致萨本栋的四封信中有一封未署日期，下面分别分析七封信的写信日期。

笔者仔细阅读了未署日期的胡适致赵元任和萨本栋二人的信，^②发现此信虽未署日期，但从信件的内容可以大体判断出此信的写作日期。为便于叙述，笔者先将信件内容（楷体部分）抄录如下，再分析其写信日期。

元任、本栋兄：

顷托华府友人发一电致廷黻云此间友好均盼吾兄与咏霓，雪艇，骝先诸兄能协同挽救中基会事。倘蒙电示至感。

适之

胡适致赵萨二人信中提到的“顷托华府友人发一电致廷黻”应指致电国民政府当时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蒋廷黻。“咏霓”指翁文灏，“雪艇”指王世杰，“骝先”指朱家骅。信中提到的“中基会”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 1924 年 9 月，是中美两国协议成立的负责美国退还第二次庚款余额的一个管理机构。

“中基会”历史上曾遭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 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新约》的签订引发的中基会存废之争；^③第二次是 1947 年底中基会美方董事对于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欲透过美国政府向国府索回欠付庚款以及增募资金的行动反感，甚至集体辞职表示抵制，中基会中方董事遂作了最坏打算，必要时不惜动用基金、瓦解该会以协助国内大学补充战后损失与发展基本科学。^④胡适信中的“挽救中基会事”当指第二次，即 1947 年底的那次危机。

另外，蒋廷黻出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的时间是 1947 年 11 月，^⑤因此，此信的写作时间应该不会早于 1947 年 11 月份。

据耿云志先生编《胡适年谱》记载，1947 年 12 月 12 日，朱家骅电告，已决聘胡适为中美教育基金会顾问，并主持其事。12 月 14 日，在南京出席中基会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先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98、1100、1111 页。

② 载于《胡适全集》，第 26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81 页

③ 张龙林：《〈中美新约〉与中基会存废之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④ 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5），1991 年，第 112-113 页。

⑤ 袁南生：《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载《湘潮》2006 年第 5 期。

董事会议。12月16日，在美使馆参加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董事顾问联席会议。12月19日回到北平^①。根据“在其位，谋其事”的常识判断，此信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947年12月12日。

而《胡适日记》也完整记录下胡适在此段时间的行程。在12月12日，胡适写道：“夜车今早到南京。下午开中基会预备会。晚上到雪艇家中久谈。他要我再赴美国一趟，这是出我以外的提议。”^②在12月13日，胡适记到：“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③在12月16日，胡适写道：“开第一次‘美国在华教育基金’的委员会与中国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国顾问是我与萨本栋、吴贻芳、韩庆濂。”^④在12月18日，胡适写道：“早晨到上海。”^⑤在12月19日，胡适写道：“搭飞机回北平。”^⑥

可见，胡适是12月12日早上到的南京，12月13日至16日，胡适以中基会中方顾问的身份在南京出席中基会的各种会议，与胡适同为中方顾问的萨本栋肯定也会一同出席，在此期间二人无须通过书信联系。直到12月19日胡适乘飞机飞回北平，萨本栋才有可能通过书信与胡适联系。因此，此信应该写于胡适已经飞回北平的1947年12月下旬。

由耿云志先生主编、黄山书社1995年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共收录有萨本栋致胡适的信八通。萨本栋致胡适八封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当时院士选举的规章制度及相关工作。在八封信中，有两封同时署了年份和日期（分别为1948年3月1日和10月9日）；有三封署了日期（分别为7月14日、8月1日和11月8日），但未署年份；有三封年份和日期均未署。

而萨本栋致胡适的八封信，尽管有六封信年份或日期信息不全，但透过信件的内容也可以大体判断出部分信件的写作日期。为便于叙述，笔者现将这六封信分别用数字作为标题、并将信件内容（楷体部分）抄录如下，再对信件写作日期进行分析。

一

适之先生道鉴：

本次评议会开会时，先生致词已经速记送来，兹送上拟请核示交还，以便付印。

① 耿云志：《胡适年谱》，载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2007年5月版，第365页。

②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6页。

③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6页。

④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7页。

⑤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8页。

⑥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9页。

敬颂 道安

弟 萨本栋 敬启

附稿一件

信中提到的“评议会”当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第一个指导协调全国学术发展的评议性机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并于1935年9月7日至9日在南京召开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年会；1941年3月13至15日，中央研究院在重庆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1944年3月8至10日，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召开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1946年10月20至22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虽然胡适早在1935年9月7日就出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但萨本栋则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从信件内容及二人进入中央研究院任职的时间来看，此信显然写于第三次年会开过不久，即1946年10月下旬。

另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有一份胡适演讲的记录稿，题为“胡评议员适之致词”。宋广波先生曾对《胡评议员适之致词》的时间进行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是1946年10月20日。^①萨本栋信中提到的“先生致词”显然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那份《胡评议员适之致词》，宋广波先生的考证结论再次印证了此信写于1946年10月下旬。

二

适之先生道右：

前者，本院为求普遍明瞭的诸学术专家概况，曾肃寸楮，并附表一份，送达左右，请就所知，介绍学术专家若干人，并示其姓名住址，俾便通讯。顷承各方协助，虽略识当世贤达；唯以先生交游素广，未承明教，终感不足。用再渎陈。希将介绍人选，早日赐寄，至为企幸。

专颂 道安

弟萨本栋 谨启

此信内容无明显信息可供参考，写作时间待考。

三

适之先生：

顷奉七月九日大函。敬悉北大现正提名院士候选人，本月十五日或可竣事，深以为慰。北大提名范围不限于一机关，到底是“大学校”的风度，更为钦佩。

^① 宋广波：《考证〈胡评议员适之致词〉的时间》，载《胡适研究通讯》2008年第1期。

至于前此所奉上之参考名单，其中医学一科，系林可胜先生以英文写出，由徐丰彦先生译成中文，人名有误，抄写时又有错，寄出时栋未曾校阅，承指出，至感。好在该名单只供参考而已。现各方来函多以搜集候选人之资料不易，对于七月廿日截止提名一节，事实上恐须展期。俟与詠霓先生商洽后当决定应否延展。

专复 并颂 教安

后学 萨本栋 顿首 七，十四

此信中提到“顷奉七月九日大函”，显然表明胡适曾于某年7月9日给萨本栋写过信。再查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收录的胡适致萨本栋的四封信，恰有一封写于1947年7月9日。而从二人通信的内容来看，均为北大提名院士一事，日期、内容都能对应得上。因此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47年7月14日。

四

适之先生：

午世电奉悉。院士提名单三大包已经照收。谢谢！报载博士学位授予法由立法院审议一节，恐系传闻失实，本早晤及考试院陈百年先生，据云新闻记者曾根据申报所载消息，向其打探内容，彼因考试院前曾起草此法，故未否认；事实上，日来并无新举动，行政院对此事一时恐无暇顾及，中研院所复行政院之议决案，至今尚未见下文，大约政府忙于他事，早将此法置诸脑后矣。

知注 特复 并颂 教安

后学 萨本栋 顿首 八、一

此信中“院士提名单三大包已经照收”当指北大提名中央研究院一事。在胡适1947年7月9日致萨本栋的信中，胡适曾回复萨本栋说：“北大提名院士的事，我们现在正举行，原则是不限于北大，是以全国为范围。大概七月十五日可以寄上。”从内容来看，此信应是萨本栋收到胡适寄来的北大院士提名名单后的回信。由此可以断定，此信应写于1947年8月1日。

五

适之先生：

十一月一日手教奉悉。明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之纪念会中学术讲演，仍恳先生拨冗南下担任。除此之外，尚拟在该时前或后召开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院士提名筹备工作大约于十二月底可以办妥，一月中评议会即须审查最后名单才来得及在明年再开院士会议时投票选举。

附上栋日昨在沪江大学之讲词一篇，在这个时候来谈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清闲同镇静的涵养罢？一笑。

嵩颂 研安

后学 萨本栋 顿首 十一、八

此信中提到的“蔡先生”显然是指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生于1868年1月11日，卒于1940年3月5日，1928年至1940年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信中“明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之纪念会”当指194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由此推断，此信应写于1947年。另外，信中提及“尚拟在该时前或后召开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可见写信时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尚未召开，故此信不可能早于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成员确定的1948年9月。综上判断，此信应写于1947年11月8日。

六

适之先生大鉴：

下届聘任评议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人选业已聘定，并经检附名单，另函奉达。依章评议员应由本院院士选举之，而第一次院士会议已定在本年九月中举行，距今仅有两个月之期间，必须在此期间内将提名手续办理完竣。但现在提名委员会各委员散处国内外各地，交通关系，召集开会事实上不无困难。似应酌予变通办理，先请各委员尽量选择合于评议员候选人之资格者，向提名委员会提名，人数可暂不拘，统由会汇集，一面再函请全体院士照章提名，以便于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前召开提名委员会，商讨各组应提出之人数及候选人之名单，用特函请警洽赐办，并盼于八月十日前将所提候选人姓名示复为禱。

祇颂 时祺

附历届评议员名单一份，院士名单一份、评议会选举规程一份

萨本栋 敬启

信中提及“第一次院士会议已定在本年九月中举行，距今仅有两个月之期间”，可见此信写于7月。而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8年9月，由此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48年7月。

萨本栋虽是学物理出身，但文字功底很好，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胡适的信中看出来。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期间，对学生的文史训练也很重视。他曾在《勗勉同学词》中勉励同学们说：“要知道祖国的可爱，应当温习史地，语文不通顺的人，在学术界不会有地位。”^①

^① 参见《唯力》旬刊第三期，1938年4月3日，转引自朱水涌：《厦大往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7页。

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因患胃癌病逝于美国，年仅47岁。此时因战局迅速逆转已经离开北平的胡适的日记也越来越简短。胡适1月31日的日记仅记“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①一句，可见胡适当天并未获知萨本栋病逝的消息。直到2月20日，胡适在日记中才再次提到了萨本栋：“萨本栋追悼会已改廿七。”^②到了2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简单地写到：“9:00，萨本栋追悼会（岳阳路320号）”。^③

根据萨本栋的遗嘱和厦门大学的要求，并经萨本栋夫人黄淑慎同意，萨本栋的骨灰全部安葬在厦门大学校内。1949年2月28日，《申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题为《胡适致词赞扬萨氏四项事业》消息，全文如下：

北大校长胡适致词称：“萨先生的事业有四方面，即是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央研究院，以及他的著作。他教授法非常之好，在北大教过一年物理，因为教得太好，以致他走后继任的教授不受学生欢迎了。他办厦门大学，是抗战期间国内最优秀的大学。他主持中央研究院太负责任，以致耽误了病症。他所著的教科书又是非常的成功。他一生二十年事业，无形中影响了无数的人。所以我赞成梅校长的观点，觉得萨先生虽然与世长逝，他的精神却是不朽的。”

胡适与萨本栋虽然专长不同，但二人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曾赴美留学，都曾担任过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校长，后又同时在中央研究院任职。我们从《胡适日记》和《胡适书信集》等著述中可以看出，胡适一生对学界同仁的评价较谨慎，虽然追悼会上的悼词难免有溢美之嫌，但胡适能对萨本栋给出如此之高的评价，足见萨本栋在胡适心目中的分量。

（董立功，厦门大学历史系2011级博士生）

胡适对待谩骂的态度

张书克

胡适一生中挨过的骂可谓多矣。他得到的骂名可真不少，两个字的有：“走狗”、“汉奸”、“反动”、“竖儒”；三个字的有：“反革命”、“叛国者”；四个字的有：“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最长的是：“作自戕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谩骂他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各路豪杰都有：有民粹派，也有卖国

①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82页。

②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86页。

③ 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88页。

贼，有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狭隘民族主义者，有陈独秀的同党少年，也有孙中山的武装同志。

也许是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对待这些谩骂，胡适毫不为意，满不在乎，一不还口，二不还手，并且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挨骂论”。胡适的“挨骂论”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不害怕、不怨恨、不动怒。

胡适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以“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自期。对任何事情，他都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忠诚于自己的观点，不会因为怕被别人谩骂和攻击而隐瞒自己的观点。1925年，在致邵飘萍的一封信（稿）中，胡适说道：“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做一个老好人，遇事唯唯诺诺，这样也许不会被人谩骂，但胡适不愿意作一个这样的不值一骂的老朽。

胡适是一个主张宽容并且心怀慈悲的人。对于那些谩骂他的人，他也是心怀慈悲而不是心怀怨恨。胡适1930年4月30日致杨铨信（稿）中的这段话知道的人一定很多：“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的确，那些谩骂别人的人至少在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人们同情的：首先，骂人的人大多不习惯于或者不善于辩论，因为没有能力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不占上风，才选择了骂人；其次，骂人是有损于骂人者自己的人格；第三，骂人者其实处于心理上的劣势，他们在表面上给人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但其实在心理上极端不自信，甚至有挫折感和受到伤害的感觉，需要用谩骂来进行心理补偿。

胡适是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胡适很有涵养，也很有雅量，对待那些谩骂他的人，他从来不以牙还牙，睚眦必报。即使自己占理，也不会轻易动怒，把正义的火气喷向别人。1962年2月24日，临去世的那一天，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酒会上，胡适说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不生气”这三个字好像是一堵防火墙，把胡适和谩骂者隔离开来，使胡适具有了一种免疫力，使胡适不至于被激怒，从而避免了堕落到和谩骂者一样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朱学勤先生对胡适有一个评价，说他没有“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朱先生这个说法我很欣赏。套用朱先生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胡适没有被谩骂者的谩骂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一起堕落。这正是胡适先生的可贵之处。

（作者单位：北京石景山区司法局）

胡适果真气量狭小吗？

焦 鹏

《西安晚报》10月9日刊载了唐宝民先生的《胡适气量狭小的一面》一文，文章通过史学大家钱穆与胡适交往的几件小事，论证了以胸怀大度著称的胡适气量狭小的一面。读完不敢苟同，特草此文，就教于唐先生。

唐文中认为胡钱二人不合的根源在于初次见面。唐文指出钱穆在初次见到胡适时就向其询问僻书，胡适无以应答，导致场面尴尬，胡适心生芥蒂，午后就离开了苏州。这为日后二人不能和谐相处埋下了隐患。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事人钱穆晚年所著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对此事的记录却与唐文并不完全相同。根据钱穆记录，胡适在演讲结束之后，并未匆匆离开，而是和钱穆同时参加了苏州省立中学校长汪典存的宴请，并一同游览了拙政园。胡适在离开时还与钱穆告别，并为其留下了自己在上海的地址，以便日后通信和交往。对此，钱穆心存感动。实际上，胡适当日下午离开真正是因为忘带了惯用的剃须刀而导致数日不能剃须，又用不惯别的剃须刀，而非唐文中所说的缘由。（当日下午离开真正原因是“忘带了…”）

唐文中提到的第二件事是钱穆向胡适借阅潘用微《求仁录》孤本一书，胡适亲自带他到另外一室中打开保险柜取书。钱穆认为胡适：“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唐文由此得出了钱穆认为胡适人格低下、内心阴暗的结论。但查阅当事人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关于此事的记录，虽对借书一事如是记录，但并无胡适人格低下、内心阴暗的结论。平心而论，借书一事与唐文结论并没有必然联系。换个角度看，反而可以看出胡适待人之诚恳，正因为其对钱穆心无芥蒂，才会当着钱穆的面打开保险柜为其取书。需要补充的是，钱穆从胡适处借得此书后，让书记为自己抄录了一个副本。后又在东四牌楼书摊上偶遇此书，仅用几毛钱就购得。钱穆记录此事之真正用心乃是表述搜求书籍之甘苦喜乐，而非对胡适的不满之情。实际上，胡适在借书方面向来慷慨。1947年，与胡适仅一面之缘的青年学生周汝昌向胡适借阅非常珍贵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书是在胡适离开大陆前所带走为数极少的几件物品之一），胡适慷慨应允。周汝昌借用此书达五月之久，在此期间胡适并未去信询问周氏此书是否用完、何时归还，而且周氏先斩后奏为自己录一副本，对此胡适也不以为怪。时隔五十年之后，已成为红学大家的周汝昌在提到此事时依然对胡适感激不尽（见宋广波《胡适与红学》）。

此外，唐文中还提到了胡适阻止钱穆任历史系主任和因钱穆解聘蒙文通两事，

以此来论证胡适因二人最初相遇一事对钱穆耿耿于怀，从而坐实胡适气量狭小之论。其实，这两件事都是正常学校人事任免问题，并非个人恩怨。对于胡适在工作中与钱穆过意不去，阻止钱穆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一事，尚未见于当事人钱穆的记录，唐文的证据是，在北大历史系主任出现空缺时，有人提议钱穆出任，胡适说过如下话语：“钱穆刚来北大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出自任继愈）。假使胡适确实说过上述话语，也并不能由此得出胡适阻止钱穆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相反倒是能看出胡适对钱穆的欣赏和认可。实际上，民国时期的纯粹学者未必热衷行政权力，钱穆先生即是一例，读钱氏所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不难发现此点。而解聘蒙文通也是事出有因，正如唐文所说的“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这一点，连钱穆自己也没有否认。二人的分歧在于钱穆看重的是教授的学术研究能力，而胡适更看重地是教授的教学能力。另外，在这件事中胡适也严守相关程序。总之，此事属于认识分歧，而非个人恩怨。假若这件事真能证明胡适气量狭小，因对钱穆耿耿于怀，进而打击排挤与钱穆交好的蒙文通。那同样与钱穆交好的汤用彤却在胡适手下长期执教北大一事又如何解释。

人性是有弱点的，胡适也莫能例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胡适或许真的存在气量狭小的一面。但是唐文中提到的几件小事却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其实只要认真翻一翻胡适或钱穆的传记，不难发现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1931年，钱穆在燕京大学没有续约的情况下，曾去拜访胡适，但未能相遇。次日致信胡适：“先生终赐卒读（指钱氏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见白吉庵《胡适传》）在此基础上，加之顾颉刚的推荐。钱穆被聘为北大历史系副教授，并且待遇比燕京大学提高了一级。胡适果真如唐文所说气量狭小，那此事又作何解释。钱穆到北大后，二人相处也比较融洽。当然，胡适和钱穆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但其真正的分歧不在于人事纠葛，而是对于本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的态度，钱穆自谓对中国固有之历史文化传统抱有温情和敬意，而胡适作为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的态度，正是这一分歧导致了二人日后的逐渐疏远。

（作者单位 西安市西光中学）

战时胡适以书面形式发表之言论目录

胡慧君

胡适在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期间, 口头演讲之外, 还有大量以书面文字形式的言论发表于各处, 今罗列如下。其中, 英文记载是根据了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所收的优金·勒·德兰菲尔, 袁同礼编《胡适西文著作目录》。为眉目清楚, 所列者前面加以连续号码。

No	日期	题目	出版状况以及参考依据
1	1937 年	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	In: Independence, Convergence and Borrowing in Institutions, Thought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Harvard Tercentenary Publications), pp. 219-247. (西文目录 13 号, 全集第 44 卷 p. 124)
2	1938 年 1 月	Chinese View of Immortality.	Hibbert Journal, Vol. 26, pp. 287-292. (西文目录 87 号, 年谱五 p. 1629)
3	1938 年 7 月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中国和日本的西化)	Amerasia, Vol. 2, No. 5 (西文目录 89 号 • 139 号, 年谱五 p. 1631)
4	1938 年 7 月	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 by E. R. Hughes, and Japan in Transition, by Emil Lederer and Emy Lederer.	In: Amerasia, July 1938 (「西文著作目录」138 号, 全集第 44 卷 P. 132), 日本的杂志『日本评论』于 1938 年 10 月把胡适的这个论文翻译成日语「日本と支那の西洋化」进行了刊登
5	1938 年 8 月	What Can America Do in the Far East Situation?	IBID, Vol. 2, No. 6, August 1938, pp. 293-295. Also in: China Weekly Review, Vol. 86, September 24, 1938, p. 106-107. (西文目录 90 号, 年谱五 p. 1632)
6	1938 年 11 月	Preface to the Symposium on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bstract)	In: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 Vol. 3, No. 2. (西文目录 148 号, 年谱五 p. 1654)
7	1938 年 12 月	My Mother	In: The Bulletin, published by the Woman's Club of Upper Montclair, New Jersey, Vol. 14, No. 3, p. 6. (西文目录 222 号, 年谱五 p. 1660)

8	1938 年 12 月	A Vow on Poetry (part of a long poem)	In: News Is My Job, by Edna Lee Booker, New York, Macmillan, 1939, p. 194 (西文目录 223 号, 年谱五 p. 1661)
9	1939年2 月	On China's Progress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 Vol. 62, No. 2, pp. 86-87. (西文目录 92 号, 年 谱五 p. 1664, 全集第 44 卷 p. 145)
10	1939年6 月	An Open Letter to the Guardian	Harvard Gardian, Vol. 3, No. 6, pp. 3-4 (西文 目录 91 号, 年谱五 p. 1670, 全集第 44 卷 p. 151)
11	1939 年	Living Philosophies Revised	In: I Believe, ed. by Clifton Fadiman. New York, Simon&Schuster, pp. 375-378. (西文目 录 14 号, 年谱五 p. 1702, 全集第 44 卷 p. 161)
12	1940年8 月	Letters to Pearl Buck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Vol. 2, No. 7, p. 3. (西文目录 96 号, 年谱五 p. 1707)
13	1940年8 月 29 日	Letters to Dr. Edward H. Hume. August 29, 1940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Vol. 6, No. 6, p. 22. (西文目录 97 号, 年谱五 p. 1707)
14	1940 年 10 月 20 日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In: 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ewey to Celebrate his 80th Birthda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0, pp. 205-219. (西文目录 15 号, 年 谱五 p. 1710)
15	1940 年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In: Freedom: Its Meaning, ed. by Ruth Nanda Ansh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Co., pp. 114-122. Also In: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ed. by C. F. Ware fo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243-251. (西文目 录 16 号, 全集第 44 卷 p. 188)
16	1941年3 月	America's Stake in China's Struggle	Front Democracy, Vol. 7, pp. 169-170. (西文 目录 99 号, 年谱五 p. 1716, 全集第 44 卷 p. 199)
17	1941 年 10 月	China's Fight for Freedom in Chinese History	Life Association News , Vol. 36, No. 2, pp. 136-138, 213-215. (西文目录 101 号, 年谱 五 p. 1742, 全集第 38 卷 p. 354)
18	1941 年 11 月 3 日	The 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1, No. 12, pp. 1-4. (西文目录 104 号, 年谱五 p. 1743,

			全集第 44 卷 p. 197)
19	1941 年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a briefer vers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In: Stud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ed.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icentennial Conference. Philadelphia, 1941, pp. 1-6(西文目录 18 号, 年谱五 p. 1752, 全集第 44 卷 p. 198)
20	1941 年	New World Order Cometh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Report for 1941. pp. 148-153. (西文目录 98 号, 年谱五 p. 1753, 全集第 44 卷 p. 198)
21	1941 年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In: Edmund J. James Lectures on Government: Second Series.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1, pp. 53-64. Also In: Proceedings,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 Problems of the Peace, Vol. 21. Los Angeles, 1944-1945, pp. 54-63. (西文目录 17 号, 年谱五 p. 1752)
22	1942 年 2 月	Pamphleteering Proves Its Power in China	The Quill, Vol. 30, No. 2, pp. 5-12. (西文目录 106 号, 年谱五 p. 1766)
23	1942 年 2 月	For Just Peace in the Pacific	Free World, Vol. 2, No. 1, pp. 9-13. (西文目录 107 号, 年谱五 p. 1766)
24	1942 年 3 月	Our Common Battle	The American Magazine , Vol. 132, No. 3, p. 25. (西文目录 108 号, 年谱五 p. 1776, 全集第 44 卷 p. 203)
25	1942 年 4 月	China's Fighting Strength and Fighting Faith	China Monthly, Vol. 3, No. 5, pp. 4-5. (西文目录 109 号, 年谱五 p. 1776, 全集第 44 卷 p. 204)
26	1942 年 5 月	Peace Has to Be Enforced . India Our Great Teacher	Asia Magazine , Vol. 42, No. 5, pp. 263-266, 323-324. (西文目录 110 号, 年谱五 p. 1778, 全集第 44 卷 p. 205)
27	1942 年 6 月 29 日	Looking Forward	Contemporary China , Vol. 2, No. 3, pp. 2-3. (西文目录 111 号, 年谱五 p. 1778)
28	1942 年 8 月	A Foreword. Foreword for Tagore's Sadhana	August, 1942. (全集第 38 卷 p. 629)
29	1942 年 9 月	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Historic China	World Affairs(Washington , D.C.) , Vol. 105, No. 3, pp. 170-173. (西文目录 112 号, 年谱五 p. 1785)
30	1942 年	Chinese Thought	Asia Magazine , Vol. 42, No. 10, p582-584.

	10 月		后边 China, ed.by Harley F. MacNa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6, pp. 221-230. (西文目录 22 号 • 113 号, 年谱五 p. 1785)
31	1942 年 12 月 14 日	Asia and the Universal World Order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 No. 15, pp. 1-4. Note: Reprinted fro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西文目录 114 号, 年谱五 p. 1791)
32	1942 年 12 月	To Win and Keep the Peace	The Peabody Reflector, Vol. 15, No. 11, pp. 406-408. (西文目录 115 号, 年谱五 p. 1791)
34	1942 年	Factors Necessary for a Durable Peace in the Pacific Area: A Chinese View	In: A Basis for the Peace to Come, ed. by Francis J. Mc Connell and others. New York, Abindon-Cokesburg Press, 1942 (The Merrick-McDowell Lectures), pp. 115-125. (西文目录 19 号, 年谱五 p. 1792, 全集第 38 卷 p. 453)

(作者单位: 日本北海道大学)

《胡适与 20 世纪上半期现代朝鲜文坛》勘误

金 哲

发表在上期《胡适研究通讯》(总第 19 期)的《胡适与 20 世纪上半期现代朝鲜文坛》中有几个地方需要更正, 具体如下:

第 11 页, 第二段第一句: 将“朝鲜现代《开辟》”中的“现代”删去。

第 11 页, 第三段中删去“这里所提到的‘梁建植’(或梁氏)就是当时朝鲜的中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梁白华。”

第 12 页, 第一段中删去“笔者最近在阅读有关胡适书信的资料时, 恰好发现了梁白华致胡适的此封信件。”

第 14 页, 第三段中出现的两个“《访问记》改为《印象记》。”

第 15 页, 第二段删掉。

第 16 页, 第四段中“《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是胡适的英文著作之一”改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是胡适的英文文章之一”。

第 17 页，第一段中“中国文艺复兴”改为《中国文艺复兴》。

第 18 页，第二段中“当时报社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朝鲜语发表在本报上”改为“当时《朝鲜日报》报社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朝鲜语发表在本报上”。

之前出现的错误请读者谅解，并给予指正。

五周岁了——代编后记

《胡适研究通讯》已经快满五周岁了。她的准确的生日应当是 2008 年的 2 月 25 日。每年出四期，到今年的 11 月 25 日，她整整出满五年 20 期。所以，我们提前在今天庆祝她的生日是挺合情理的。

记得五年半以前，2007 年的 5 月初，我应邀到台北胡适纪念馆访问。我同当时纪念馆的主任黄克武先生谈起，我想办一个《胡适研究通讯》作为海内外同好者的一个园地。借此，大家可以互通声气，交流意见，推动胡适研究的进展。黄主任很赞成这个想法，并表示可以用胡适在大陆保存的一部分版税，来支持这个刊物的印行。不过此事须经胡适纪念馆管理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我回北京后不久，黄主任就告诉我，资助编刊《胡适研究通讯》的议案已经通过。我很感谢管委会诸君的雅量与盛情。又不久，第一批资助款便拨到胡适研究会的账上。我便起草创刊启事，通告海内外对胡适研究有兴趣的朋友，请他们积极撰稿。同时决定请宋广波先生做这个刊物的常务编辑。我和广波忙了两三个月，2008 年的 2 月 25 日终于印出了《胡适研究通讯》的第一期。我和读者都感觉到这个新生命来之不易。虽然形式不免简陋，但内容是很充实的。

从那时以来，承蒙海内外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这个刊物的读者越来越多，撰稿者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每有不相识的新作者来稿，我都非常兴奋。这不仅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胡适，胡适的思想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力量。这是我最为期待的。

感谢胡适纪念馆诸君的大力支持，感谢陈宏正先生等海内外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的作者和读者，希望能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让这个将满周五岁的生命健康茁壮地成长。

我们不需要高超的议论，激越的口号，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工作，一寸一尺地进步，让每一个进步都是不可动摇的，不可逆转的，长期奋斗，就会积累起一个理想的成功。

耿云志 2012, 11, 25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